

在张力中 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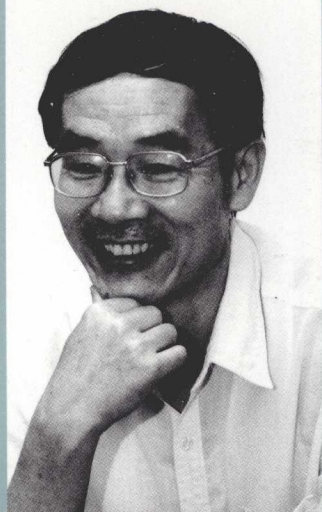


名家讲谈

思想开放
个性好读

极高明而道中庸

在张力中 思索



邓晓芒 著

名家
讲谈

思想 开放
个性 好读

邓晓芒 著

极 高 明 而 道 中 庸

在张力中思索



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张力中思索 / 邓晓芒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11
(名家讲谈)
ISBN 978-7-5334-5223-0

I. 在… II. 邓…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05835号

在张力中思索

邓晓芒 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10-62027445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编: 276017)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197千

版次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读者服务部 (电话: 010-62027445) 联系调换。

《东南大学人文讲演录》丛书编委会

顾 问：胡凌云 易 红

主 任：郑家茂

委 员：（按音序排列）

陈 怡 董 群 樊和平 蒋建清 凌继尧

陆 挺 吕乃基 王步高 王廷信 熊宏齐

徐 宏 徐 悦 张祥浩 张 燕

总体策划：陆 挺

总 序

高山起于深海，这套《东南大学人文讲演录》丛书缘起于历百余年的东南大学人文教育传统和持续十几年之久的东南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丛书在反映东南大学人文教育盛况的同时，也体现着我们对大学文化建设和人文教育理念的探索与思考。

大学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摇篮，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发挥作用。大学以其高品位的文化来浸润和培育学子的精神世界，以无用之形营卫大用，以澹泊之心收获大利。大学的文化品位固化于校园的大楼与大树之间，体现于人文与自然之美的有机相连，显现于师生的语默止静和为学任事之中。

大学的文化品位首先是历史的积淀。这种积淀使大学继承了绵延的文化血脉和高贵的精神品质。东南大学地处南朝刘宋四学、萧梁五馆、有明南雍和国立中央大学的旧址，三千年吴文化崇文重教、广博易良的气韵风骨和江左百代文枢的荣辱沉浮，孕育了这所百年学府崇高、沉静、雄毅的精神气质。徜徉在东大校园，遒劲挺拔的六朝松，巍然高耸的穹顶礼堂，九龙湖畔重檐庑殿式的教学楼、气势雄伟的李文正图书馆，大树与大楼折射出深厚的历史底蕴、雄伟的文化气魄，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超凡的文化诉求会不自觉地在我心中涌动，我们仿佛体味到，将“止于至善”作为校训是这所大学基于文化源脉的自然流向。

东南大学的人文教育传统可溯至其前身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其时，任学堂监督（即校长）的晚清著名的书画家李瑞清将学科设置依科学、国学、美术鼎足三分，初奠人文教育之规模。其后，国立东南大学首任校长郭秉文力

倡“通才与专才平衡，人文与科学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的办学方针，高扬人文精神。一时，东南大学名师荟萃，俊彦云集。陶行知、陈鹤琴、任鸿隽、胡刚复、熊正理、竺可桢、熊庆来、叶企孙、秉志、邹秉文、胡先骕、茅以升、杨杏佛、孙本文、马寅初、李叔同这些史册中熠熠生辉的名字，使东南大学获得了“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的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的称誉。

1922年，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柳诒徵、汤用彤等在东大创办了以“倡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杂志，围绕《学衡》形成了独立的文人群体——“学衡派”，形成了五四运动之后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营垒，为东南大学建立了鼎盛的人文传统。其后，罗家伦校长将构建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确立为国立中央大学永久的使命，这为中央大学发展为当时全国科系最全、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以有机的文化培育通才的理念和延续发展民族文化为使命的泱泱大风，在一代代东大人身上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大学的文化品位既基于历史传统，又根植于现实的创造。正如曾三次登上东南大学人文讲坛的著名社会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教授所言，“一所大学的文化生活常决定这所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和有文化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大学之大在于博大与深刻，大学的风格与与大师紧密相连。大学依靠学术大师用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吸引和影响求知若渴的学子。

百余年来，东大养成了自己亲近学术大师的传统。上世纪初，著名哲学

家杜威、罗素，文学泰斗泰戈尔以及梁启超、胡适等人文大师、学术巨擘都曾在东大开席筵讲。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继承与发扬悠久的学术演讲传统，致力于为东大学子提供一种创造性的文化生活，力邀科学巨匠、人文大师、文化名人开设精品人文课程，开设高品位的讲座，举办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十余年来，数百位人文名家和科学大师在东南大学登坛讲演，一时声振金陵，盛甲东南。

以塑造高峰体验为特征的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成为“学在东大”文化形象的重要标志。“华灯初上，大师入席；群生拥座，校歌声起；讲者娓娓，听者如醉；相与问答，引人入胜”是东大人追求博雅文化最为动人的文化生活场面。它与这所大学的大楼和大树一样存留在东大学子们灵魂的最深处。东大学子们正是在享用畅酣淋漓的精神盛宴中茁壮成长，聆听高品位的人文讲座和高水平的人文课程、亲近科学和人文大师成为东大学子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孟子曾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东大学子正是在这种高格调文化生活中获得了“高峰体验”，养成了博大的胸怀和宏阔的视野，使自己的思维深刻、追求的境界高远。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作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者，我们深恐随着时间的推移，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文字的阙如而流失，故而将名家大师们的精彩演讲和上课实录辑为“东南大学人文讲演录”，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文学、美学、文化、人文教育、学术人生等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囊括众学。读者可从文字符号承载的广阔宇宙中，一览时彦关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内

外之道、中西之学的精彩论述，体味一代学术郁郁乎文的蔚然盛况和一代学人光风霁月的德业气象。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所有关心大学人文教育的读者，以期将东南大学人文教育的精神成果与大家共同分享，在学术思想界和广大读者之间架起达道通衢。愿这套丛书能如开启当代学术殿堂的钥匙，使读者得人其门，一览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东南大学人文讲演录》丛书编委会

二零零九年元月二日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讲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德状况的反思 / 6

中国道德状况三十年的反思使我们认识到一个真理，就是道德不单纯是情感的事情，道德更多的是理性的事情。

第二讲 我们为什么没有超越性的信仰？ / 37

我们今天为我们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没有真正的信仰而悲哀，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失落，而是发现了真相。我们真的没有信仰，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去捡回失落了的信仰，不是“要顶住”，而是反思我们几千年来没有真正的信仰原因何在。

第三讲 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反思 / 60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不反对，但是弘扬的首要的方式就是批判，所以，我提出，我们只有批判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发展传统文化，或者说才能发展我们中国的文化。

第四讲 中西生死观比较 / 97

别的问题你都可以说是别人的事情，你可以推脱责任，但是生与死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的，要由你自己来决定，没有人能够给你拿主意。生死问题说到底就是终极关怀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也就是你如何看待你人生的问题，如何对待死亡的问题。

第五讲 中西信仰观比较 / 124

西方人的自我意识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断后退的过程；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是一个静止的结构，一次性规定好的结构。

第六讲 中西艺术精神比较 / 153

我们要了解西方人与西方的文化，那么艺术和审美这个环节是不可或缺的。同样，西方要了解中国这个历史悠久、古老的文化，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也必然要深入到我们文化心理的深处。

第七讲 谈谈金规则的三种模式 / 183

在1973年国际的全球伦理芝加哥大会上，正式地把这一条规则定名为“金规则”，就是都承认这一条，叫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我们却不能用这样一条金规则使大家能够进入共同的道德语境，为什么？

第八讲 康德宗教伦理对我们的启示 / 203

康德恰好揭示了西方文化的这样一个深层结构。西方文化它总是发现矛盾，发现对立，造成痛苦，然后追求。而中国文化呢，老是回到本心，就没有痛苦了，就非常安妥了，觉得自己一切都得到安慰，得到解脱了。

前 言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我的母亲经常和我提到，我长到四岁还不会说话，要表达一个意思，只能用手比划，曾被托儿所退回来过。五岁进幼儿园，七岁上小学，还是不太会说，尤其在正式场合发个言什么的，都要脸红。十六岁那年下乡当知青，和农民混熟了，他们送我一个绰号叫“阴阳官”，意思是我一般不说话，一说就是一语双关，阴阳莫辨，甚至暗藏机锋，常常让听者开怀一笑。总地来看，我仍然不爱说，甚至不爱集体活动，包括集体排节目、集体唱歌，能够回避的我尽量回避。当然，多年的知青生活也改变了我，我后来也能够体会到大家在一起尽情高歌的乐趣了，特别是当我们自发地分成多声部合唱那些外国名歌的时候，真是令人陶醉。但长篇大论的演讲素来不是我的所长，我很羡慕那些口才出众的朋友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这时我总是充当忠实的听众，而我自己是连一个完整的故事也讲不好的。

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发生在我读了大量哲学书之后。1974年返城，我在打工之余，结交了两三个爱好哲学的朋友，都是一些通过自学而满腹经纶之士。我与他们交谈，发现要和他们说清楚一个问题，必须用极严格的句子和术语词汇，按照极严格的逻辑来表达意思。而每当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我的话语突然畅通起来，思路也随着话语的畅通而打开，四通八达了。但我讲一般的世俗的事情，特别是讲故事、讲笑话，仍然讲不好。1979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师从陈修斋、杨祖陶两位先生研究西方哲学史，我的逻辑语言得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但我并不认为凭这个，我就可以占领大学讲台。相反，我自认为在引经据典、妙趣横生地讲解一种思想观点方面自



己的能力还太差，不适合于上讲台。记得当年研究生毕业时，陈、杨二位先生找我谈话，让我考虑留系工作的事，我虽然口头上答应了，心里却仍然有点忐忑不安，我原来的想法是找一个研究单位专门做科研。后来我把自己的担忧向杨老师说过，我说我的口头表达不是很好，怕在讲台上吸引不了学生。杨老师当时说了一句使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我看你还可以！”这句话让我信心陡然大增。尽管如此，我第一堂课给同学们讲美学原理时，脑子里仍然紧张得一塌糊涂，据来听课的好朋友易中天说，那堂课我基本上是“背对着学生”讲下来的。虽然有所夸张，但给人的感觉的确如此。现在回忆起来，最初给学生上课的那两三年，我每次走近教室时都要捏一把汗，而下课离开教室时则有一种征服感和成就感。

现在当然无所谓了。经过二十多年的历练，我在课堂上已经完全能够收放自如了。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感到奇怪，那些在备课时根本没有考虑过的句子和观点一下子都自己涌到了嘴边，经常不得不打断话头，以免离题太远。整个1980年代是一个演讲盛行的时代，那时经常有人来邀请作各种主题的演讲，讲美学，讲人类学，讲西方哲学，邀请单位除了本校和外校的学生会、团委之外，还有社会上的街道文化机构。记得汉口的民族街文化宫来武汉大学请我讲演有许多次，每次晚饭后自己坐公交车过长江，讲完后已是10点钟了，再坐公交车回来，下车后还要走十几分钟才到家，报酬是15元。那些听众都是社会上的求知者，有文学青年，有“文革”中被耽误了的中年人，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我每次讲演都很认真地准备，通常都写成三行字一段的讲演稿，用红笔标出重点词来，基本上不离讲稿。现在我已经可以只列一个提纲，甚至只写几个字，就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三个小时了，这种能力与那时的基本功训练是分不开的。有了这种功夫垫底，我常常把课堂当作了我做研究的实验室，也就是有意把一些平时没有想清楚的问题放在讲演过程中去理清楚。我还发现，往往在课堂上讲出来的东西要比正式写出来的学术文章更丰富，更深入，也更清晰。现在我已经把课堂讲课录音作为我做学问的另一条重要途径，以其通俗易懂和清晰简明形成对学术著作或文章的互补。而专题讲座则更是自由发挥自己思想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通常只要有时间，我对各地各单位邀请演讲几乎是来者不拒。其中，最

经常演讲的地方一个是华中科技大学，从1990年代至今我在那里已经举行过20多次讲座，可惜留下的录音资料不多；再一个是西南政法大学，我从2004年以来三次赴西南政法大学讲学，每次一周，现已根据录音整理出版了三本书，它们是：《康德哲学讲演录》、《邓晓芒讲黑格尔》和《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还有是2004年赴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讲了九讲，这个系列的录音经过整理和补充形成了《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再就是东南大学的系列讲座了。从2002年开始，我已三赴东南大学举办人文讲座，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讲演录，就是这三次共八场讲演的录音整理稿的集结。

东南大学这几次讲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集中于对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思考。这些话题我在别的地方也讲过，有些还收入到了其他论文集或者讲演录中，当然我每次讲同一个题目还是有些不同的，那就看临场发挥了。这里收入的八篇都是在东南大学讲的，我觉得还是发挥得比较好的。之所以集中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话题上，是因为东南大学历来强调对工科学生进行文化素养方面的熏陶，而这种熏陶，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我的一个观点是，中西文化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距离最遥远、性质最不同的两种文化，其余的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正因为如此，这两种文化的比较是最具启发意义的。有人可能会说，既然两种文化距离最远，那么也就是说最缺乏可比性，最少比较的共同基础，怎么会有启发意义呢？但我认为，正由于文化间的这种极限距离，双方的文化根基才有可能在比较中暴露得最为彻底。至于它们的可比性的共同基础，那就是共同的人性。自从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开始，几千年来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远东和西方（包括印度、阿拉伯世界等等）虽有过相互的影响，但基本上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两种在许多方面都呈现相反结构的文化传统。而1840年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终止了这种相对而言互不干涉地各自发展的道路，而把这两个极端置于剧烈的相互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把我们人性中最深层次的根都展示出来了。在这里，我们身为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理解能力，那么我们通过中西比较（而不是通过中印比较、中国和阿拉伯比较），能够最透彻地把握我们中国文化的根



抵，同时反过来也最透彻地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柢。这样，我们也就最透彻地把握了人性的根柢。这样一个视角，即便是西方学者，也未见得就清楚意识到了，他们出于西方中心主义，通常对中国的事情比较忽视。而中国学者则难以摆脱华夏中心主义。但我认为，这两种主义都是应当克服的，谁都不能自认为自己表达了人性的全部底蕴。真正对人性的深入了解必须在一种巨大的张力中才能做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张力。

另外一种张力就是古今的张力。中西之争不完全等同于古今之争，当然两者也有联系，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维度。古今之争就是要不要现代化之争，要不要发展之争。国内外都有人认为，现代化、发展，这都是一些过时的概念，后现代主义特别强调取消这些带有启蒙理性色彩的概念。有的国家甚至就是这样做的，在他们的国家里，发展不是“硬道理”，生活的质量才是硬道理。例如有人到波兰去访问，看到那里仍然是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虽然有现代科技，但生活方式仍然和古代没有多大差别，保持着田园牧歌式的风格，连电脑、网络都很少用。但那种舒适、自在、轻松和富裕是浮现在每个人脸上的，贫富差别很小，社会公正，秩序井然，环境保护得极好。不过我们可以羡慕他们，却不能够学他们，因为中国太大了，也太特殊了。在中国，不发展确实就是死路一条。也许一百年以后，当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特别是人的观念完成了现代化以后，我们可以像波兰一样，回到古代理想的生存方式，那时我们已经有了返回的本钱了。但现在不行，不仅是客观上做不到，而且主观上也不应该。现在的复古绝对是社会的倒退。

第三种张力是理想和现实的张力。现在一些人抵制普世价值，拒斥西方文化，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合国情”，并认为所谓普世价值也不过是西方人的“国情”而已。这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当它听说外面的世界后，就想象那个世界也不过是另一个井口而已一样。但他们的论调确实很有迷惑性，因为他们诉诸现实，而中国人最讲现实。然而他们恰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种现实，这就是发展着的现实；也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种“国情”，这就是躁动着的新国情。这种现实和国情真正是梁任公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呼唤一种在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因而目前还只是在理想中出现的价值观。尽管这种理想在西方早已成为了现实，是不是符合中国国情还

有待于检验，但至少，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理想已经明显不适合于今天的国情了，虽然它在几千年的传统中本身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国情，但现在已经远离了国情。最讲国情的人其实最不懂得国情。所以我们看今天那些儒家信徒们所提出的社会改造方案，会觉得如同痴人说梦，顶多是一种“行为艺术”，只表明了他们自己个人的一种想法而已。他们高高在上，生活在古代的文本之中，对眼前发生的社会变化除了道德上的指责外，就是视若无睹、没有兴趣。相反，“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在今天虽然还被以种种借口加以贬低和排斥，倒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着现实的作用，被维权律师们援引来处理各种现实的纠纷。当然，这些价值观要真正在中国站稳脚跟还需要时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障碍就是这些“保守主义者”们的顽抗），但现在谁都可以看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国社会生活汇入国际普世规范的大环境中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就应了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凡是合乎时代发展方向的，都必定会实现出来。而那些“不合理的”、即不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空想，不管它们曾经多么辉煌、多么有效地激动过人们的心，注定都会成为旧时代的挽歌。

本书的几场讲演就是在上述三种张力中展开的。在今天，谈文化问题离不开现实问题，而谈现实问题又只有通过中西、古今、现实与理想的对比才能深入。自从1980年代起，我研究中西文化比较这个课题已有二十多年了，我的观点一以贯之，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借鉴西方文化来批判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用这种方式促进中西文化的互相了解和中国文化的提升。这种提升，也可以说是“弘扬”。弘扬不是口头上鼓噪和宣传的事，而是需要身体力行地进行理论上的创造，中国文化有多大的生命力，就看她能否雍容大度地吸收异己文化的因素来营养自身，通过新陈代谢而排除毒素，更新自身。我把这叫作“新批判主义”，并认为这是整个21世纪中国人所必须完成的一件世纪工程。

邓晓芒，2009年1月21日，于珞珈山

第一讲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道德状况的反思

今天讲的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状况的一种反思。在这方面跟大家谈一谈自己的感想。

改革开放到已经三十年了，这个大家有目共睹，在这三十年里面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的是大大提高了。除了极个别的地区以外，民生问题基本已经解决。比如说，吃饭的问题——中国的吃饭问题，有史以来，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样一个大问题，自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发明以来，基本得到了解决，温饱已经有了保障，至少我们现在没有听说哪里饿死人。这个情况已经不见了，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的发展中，这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当政的人必须要考虑的头等问题。现在哪怕是灾年，都不再有粮食问题。这个我们现在很清楚，包括现在的粮价上涨所导致的危机，不能说对中国没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紧张，至少没有听说哪里有囤积粮食、抢购粮食的现象。这应该说是一个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年，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应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另一方面呢，社会的道德水平的下滑，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们今天来看，从这方面，恐怕是属于我们历史上的最低点。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场合之下，民族的道德素质下降，不道德的风气到处都有，而且还无耻。这种情况历史上也有过，但是，从历史的记载来讲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彻底。今天是从下到上，从市井小民到高等学府，整个社会呈现出道德沦丧的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种趋向。下面有各种各样黑心的事件：黑心棉、黑心粮食、黑心食品。上面有腐败大案，各种腐败大案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沉沦和绝望，我们今天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在看得见

的未来会有什么希望，会有什么起色，好像没有。我们经常说有一件事情会把我们国人的心凝聚起来，确实，比如说这个奥运火炬的传递，比如说2008年的抗震救灾。那样的大事件确实在某一瞬间把国人的心都凝聚起来了，但这毕竟不是长久的，在事件过后，我们还要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就靠这样一些暂时的凝聚，它是不起作用的。道德它不是一时的雄心就可以造就起来的，它是一个国民的素质。有没有这样的素质，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间，在你的习惯中间，在你的对社会的评价中间，随时都可以表现出来。而我们今天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见怪不怪：看到腐败现象，看到不道德现象，我们已经习惯了，已经不奇怪了。相反，不做坏事，反而成了罕见的美德。如果不做坏事，如果一个人为官几年，没有做过坏事，干了他本职的事情，那就很了不起了。我们当政的人，有的说是在任内要干“十件实事”，干实事不就是当官的责任吗？但也成了一个可以标榜的道德金牌了。不干坏事就成了一种美德，这就是一个非常低的要求了。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地对三十年来我们的道德状况作一个反思。这个三十年我是一个过来人，我主要谈我自己的感觉。

回想三十年前，我们的社会刚刚从“四人帮”的阴影中解放出来，那种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泛道德主义，人们已经看穿了那是一种伪善。在进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样一种极“左”的泛道德主义思潮慢慢地退去。当然不是那么顺利的了，中间始终有泛道德主义的回潮，但是毕竟一年比一年不同了，一天比一天不同了。整个人性在三十年前，如果我们回到三十年前，我们就会发现人性是很不同的，现在人性是很放松的，人与人之间拆除了那种阶级斗争的壁垒。十年“文革”把人际关系搞得非常紧张，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时都在寻找身边的阶级敌人，每个人都怀着一种警惕的眼光。看你革命警惕性高不高，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没有经历过那一段时间的人，可能想象不出来，我们是经历过“文革”，是过来人，感受很深。到了八十年代初，人们开始互相理解，以前的很多误解，由于政治斗争所造成的误解，都开始慢慢消融了。科学的春天，实际上是人性的春天，已经到来了。有些以前在